

R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

徐以骅 主编

后冷战时期的 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

徐以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

徐以骅 主编

后冷战时期的 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

徐以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徐以骅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
ISBN 978-7-208-12414-1

I. ①后… II. ①徐… III. ①宗教-关系-政治-研究-美国②宗教-关系-外交-研究-美国 IV.
①B928.712②D771.2③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1759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 ·

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

徐以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189,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414-1/D·2516

定价 38.00元

宗教与当代美国政治和外交(代序)

自2004年本人创办《宗教与美国社会》集刊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在此10年中,无论是美国宗教还是美国宗教研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和运作方向,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事实上,在《宗教与美国社会》的第一至第八辑中,^①上述变化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在《宗教与美国社会》创刊1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变化的学术含义作两个方面的概括和检视。

一是对美国国内宗教发展趋势的基本评估。

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学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如果说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或称“六天战争”)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要转折点,^②那么1979年“道德多数派”的成立,则标志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的崛起和“政治觉醒”,并因此而成为近30多年来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宗教保守派的复兴和政治参与是美国宗教发展的主旋律和大趋势,这不仅与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同步,而且与政治伊斯兰、拉美解放

^① 此八辑分别为《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二辑)、《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三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第五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第七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八辑)。以上各辑均由时事出版社出版。从2012年起《宗教与美国社会》为CSSCI来源集刊。

^② 阿拉伯世界在此次战争中的失败“使许多愤怒的阿拉伯人从纳赛尔世俗的泛阿拉伯主义转向激进伊斯兰”。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2011), p.20.

神学思潮等一样，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典型事例。

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以及宗教新右翼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参与，完全出乎长期以来浸润于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美国世俗媒体和政界的意料，同时也使把现代化等同于世俗化的美国学界大跌眼镜，其典型事例便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倡导世俗化理论的标志性人物彼得·贝格尔 (Peter L. Berger)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转而信奉“非世俗化”理论，在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对其早期的理论观点作了全面修正。^①无独有偶，20 世纪 60 年代以预言美国宗教下降趋势的《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一书成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哈维·考克斯 (Harvey Cox)，在其 80 年代的新著《世俗之城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Secular City*)中也不得不收回此前预言。^②

从 1966 年《时代周刊》复活节专号采用“上帝已死？”(*Is God Dead?*) 作为其封面标题，到 20 世纪余下的 30 多年间，无论在政界、学术界还是在媒体上，世俗主义观念和话语仍具有主导性。英国《经济学家》的两位编辑，用新闻记者的笔法对英美知识界对宗教的排斥作了以下描述：

到 20 世纪末知识界对现代人摆脱上帝很少有疑问。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许多引领潮流的著作都通过世俗的镜片来看待世界。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就预言自由主义以及世俗化的胜利。“宗教”一词并未出现在 1994 年出版的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长达 900 页的关于经邦济世的名著《大外交》的索引中。在 1980 年至 1999 年间美国四大国际关系期刊中只有半打文章论及宗教。《经济学家》对上帝之死是如此确信，以致在千禧年专号中我们发布了上帝的讣告。^③

① 这两个时期彼得·贝格尔的标志性著作均有中译本，即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何光沪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以及彼得·贝格尔：《世界的非世俗化》，李骏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载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10—511 页。

③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p.12.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彼得·贝格尔和哈维·考克斯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全球宗教复兴、在宗教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异类”而与发展中国家成为同类、宗教发展的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截然不同,以及美国作为世俗化理论难以涵盖的“化外之国”等等,是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美国求学时宗教研究专业圈中的小众议题。“9·11事件”以悲剧性方式宣告了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强势回归,于是乎“世界的复魅”、“上帝归来”、“上帝的世纪”、“上帝赢了”、“上帝的报复”、“全球化的上帝”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术出版物,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尤其是美国学界宗教研究的流行范式。^①在学术界清算“世俗化理论”的声浪中,20世纪后半期增长迅速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得到了最大的关注。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以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为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的“政治觉醒”以及在美国社会和内政外交中作用突显的两大标志,美国上述宗教力量的社会和政治动员能量在21世纪初达到了高峰。

然而,号称美国史上第四次“宗教大觉醒”的最近这次宗教复兴,在为时近30年后已盛极而衰,开始步入调整期甚至衰退期。事实上无论是媒体还是宗教学界都注意到这种悄然而至的变化。2007年,《纽约时代杂志》(*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就已发表该报驻华盛顿记者柯克帕特里克(David D.Kirkpatrick)的题为《福音派已日暮途穷?》的封面文章;^②2009年,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编辑米查姆(Jon Meacham)在该刊封面文章中也宣称“基督教美国的终结”^③。此类宣布基督教福音派政治失势的评论文章在其他刊物和网络媒体上也是屡见

① 参见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6页。

② David D.Kirkpatrick, “End Times for Evangelical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0, 2007, cover page.

③ Jon Meacham, “The End of Christian America,” *Newsweek*, April 13, 2009.

不鲜的，而且越炒越热。作为学术回应，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马克·查维斯(Mark Chaves)的著作《美国宗教的当前趋势》^①以及哈佛大学著名公共政策讲座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和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维·E.坎贝尔(David E.Campbell)合著的《美国恩典：宗教如何分裂和团结我们》^②两部近著尤为引人注目。此两部宗教社会学著作均依据大量和长期的社会学调查，得出了“美国宗教在最近数十年中事实上——尽管缓慢但却明白无误——已经衰退”，以及“悄然而至的世俗主义”(creeping secularism)是“当今美国生活的基本事实”等结论。^③罗伯特·D.普特南教授及合作者更认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福音派繁荣”到90年代初就已结束，在21世纪的美国，扩张性的福音派早已是“明日黄花”和“强弩之末”了。如此说来保守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在20世纪末以来几届美国大选尤其是2004年大选中的抢眼表现只能被看作是其“落日余晖”。^④

当然，正如本书要指出的那样，对美国宗教长期发展的任何线性预测都存在风险和误导性，而有关美国宗教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的“宏大叙事”也绝不止“衰退论”一家。美国近年来宗教发展的统计数据目前还不至于使彼得·贝格尔和哈维·考克斯等再度改弦更张，也并未表明美国正在步法国或欧洲之后尘，驶入世俗化的快车道，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发展前景逐渐暗淡，其社会动员和政治操控能力也今不如昔，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便对当代学者提出了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和研究美国宗教发展的学术或方法论问题，如《美国宗教的当前趋势》作者马克·查维斯就认为这个时间段或观察周期得有半个世纪以上。他在一篇题为《美国宗教的衰退?》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通过一

① Mark Chaves, *American Religion: Contemporary Trend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Robert D.Putnam and David E.Campbell,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③ 参见本书第八章《宗教与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

④ Robert D.Putnam and David E.Campbell,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pp.91—133.

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宗教走向是必须的,因为若干关键的美国宗教趋势发展缓慢——甚至犹如冰川。但发展缓慢并不意味着无关紧要,长期但缓慢的社会变迁可以是深刻的社会变迁。更长的高质量时间序列数据的建立使我们能看到过去看不到的变迁,而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应是尽可能地继续从现有数据中建立时间序列,综合多个来源的适用数据,并且继续收集数据以把高质量时间序列数据延伸到未来。这便是如何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有力的方法,也是对美国宗教有重要新发现的确定路径。”^①

二是宗教对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参与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

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的盛衰自然波及美国的对外关系领域,作为“国际主义新锐”,基督教福音派对传统上属于基督教自由派领地的对外事务的参与不仅在国外造成美国外交“福音化”的印象,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②在美国历史上,宗教与对外政策一直有密切且复杂的关系。^③20世纪初威尔逊政府的外交就有“传教士外交”之称。^④从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外交史来看,宗教因素的作用最突出地体现在1911年美国国会因犹太人问题废除俄美商约、1973年美国国会针对苏联犹太人问题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以及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等三大事件上,因此目前美国学术界对关于宗教是在冷战之前、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时间段对美国外交政策更具影响的问题尚存在争议。照乔治·

① Mark Chaves,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eligion?” Feb.2011, the ARDA guiding paper, <http://www.tearda.com/rrh/papers/guidingpapers/Chaves.pdf> (2012年10月11日查阅), p.9.

② 就各宗教而言,在传统上新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宗教。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给出以下三点理由:(1)新教曾塑造美国大部分人的身份认同,并且仍为美国多数人的信仰;(2)作为美国第二大信仰和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天主教的变化呈现较为复杂的景象,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小;(3)美国其他宗教团体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甚微。Walter Russell Mead, “God’s Country?” in *Foreign Affairs* (Sept./Oct.2006), p.25.

③ 可参见 Leo P. Ribuffo,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p.1—31.

④ 此为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林肯(Arthur Link)对威尔逊外交的描述。可参见尤金·P.特兰尼(Eugene P. Trani):《伍德罗·威尔逊、中国与传教士》,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3辑),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注①。

华盛顿大学著名美国外交史学者利奥·P.里布福(Leo P.Ribuffo)教授的说法,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以来,美国政府和宗教团体就不时关注海外宗教问题,宗教及宗教团体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也曾发生过重要影响。因此,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出台只不过是“许多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海外宗教自由关注的官方体现”^①。不过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中日益显著,除“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之外,“福音化的外交政策”还体现在《2000年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2002年苏丹和平法》、《2004年朝鲜人权法》,以及被称为“医疗马歇尔计划”的“2003年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等立法和援助计划上。^②在海外倡导和推进所谓宗教自由、或把宗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似已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新的外交政策共识。

本书着重分析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背景、途径、机制、过程、效果,归纳出当前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所呈现的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和安全化等七个或显或隐的趋势,试图通过宗教与美国对外事务之间实际上形成的诸种因素互动的反馈环路来描述在公共政策领域美国宗教团体、民众、国会和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对宗教及其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事务的各种传统和现实的制约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③

① Leo P.Ribuffo,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S.Foreign Policy,” in Ellio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1.关于美国学界对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学术研究可参见 Andrew Preston, “Bridging Gap between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5(November 2006), pp.783—812.关于冷战期间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参见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3); Axel R.Schafer, “Religi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Cold War, the State and Resurgent Evangelicalism,” in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75—193。

② Jeffrey Hayne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he UAS, India and Ira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9, no.1(2008), pp.150—151.

③ 除本书外,有关论述还可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第510—537页。

从学术研究上说,宗教对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也是美国学术界近年来的一個新增点。宗教和外交分别是“美国史领域最重要且得到最多研究的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此两大学科却并无多少交集,甚至形同陌路,专门从事研究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学者可说是屈指可数。利奥·P.里布福教授曾这样形容说:“政治和外交史学者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像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和马克·诺尔(Mark Noll)这样重要的[宗教]学者的著述。”^①全球宗教复兴以及宗教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凸显,推动了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②并引起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和教会(尤其是福音派教会)领袖的关注。^③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也有不少讨论。^④

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也受到学科发展的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

① Andrew Preston, “Bridging Gap between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p.786—787.

② 研究论著除前引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S. Foreign Policy* 外,还有 Allen D.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 *The Mighty and Almighty: Reflection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Robert A.Seiple and Dennis R.Hoover, eds., *Religion &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Boulder: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Douglas M.Johnston, Jr., *Religion, Terror and Error,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llenge of Spiritual Engagement*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1); Walter Russell Mead, “God's Country?” in *Foreign Affairs* (Sept./Oct.2006); Leslie H.Gelb and Justine A.Rosenthal, “The Rise of Ethics in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William Martin,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no.114 (Spring 1999); Elizabeth H.Prodromow, “U.S.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k Mil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Survival*, vol.46, no.1 (Spring 2004), pp.23—37; Jeffrey Hayne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he UAS, India and Ira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pp.143—165。关于宗教与美国外交史的专著也相继出版,包括 William Charles Inboden, III,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以及 Andrew Preston,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12)。

③ 可参见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4辑上),第3—33页。福音派教会领袖也开始积极参与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宗教因素的学术讨论和与学界的对话,2007年3月18日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召开的有多位福音派教会、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及学界头面人物参加的“福音派与外交政策研讨会”(Symposium on Evangelicals and Foreign Policy)就是一例。

④ 其中专著有杨卫东:《信仰的构建与解读——宗教与美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参见上引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第513页,注①。

以来,美国外交史学领域已出现所谓两大转向,即“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前者主要指对非传统课题如性别、种族、话语、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的研究,并借助大量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后者则指打破传统的疆域本位和美国中心论,走国际化的路线,将美国研究置于国际及全球背景,并使用多元/多国/多语种档案的研究进路。^①宗教作为跨国文化现象,其研究不仅在“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中居重要地位,并且还处于两个转向的交互点。与此同一时期,研究者们也开始把研究视角从对政府政策和决策者转向对基层和民间。用美国外交史学家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的话来说,了解美国广泛宗教影响的唯一方法就是兼顾决策精英以及美国广大信众这高低两端。后者虽不制定政策,却通过政治压力和海外行动主义对决策产生集体影响。^②因此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无疑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③过去那种只有历史学者才关注宗教研究的局面^④已得到较大改观。

作为全球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都在美国有栖身之地;美国又是目前世界上在宗教上最具有扩张性且具有向世界各地投射宗教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在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同时,也通过其教牧大亨(pastorpreneurs,或可译为教牧创业者)、慈善事业(philanthropy)、基督教传媒(Christian media)以及传教士(missionaries)这四个“宗教出口业”的“要害部门”将美国宗教以及美国宗教观念和模式输送

① 参见 Michael Hogan,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8, no.1(Jan.2004), pp.1—21。在这篇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演讲中,迈克尔·霍根批评说,虽然美国外交史学已基本上实现上述“两大转向”,但仍落后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以及美国学研究。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史的国际化是正在没有来自那些实际上为美国国际史专家的实质性贡献的情况下发生的”。

② Andrew Preston,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p.6.

③ 参见徐以骅:《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上),第23—24页。

④ Andrew Preston,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p.5.

到世界各地。^①而美国宗教在形塑来自世界各地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宗教的同时,也为所有这些外来宗教和当地宗教所形塑。因此,美国宗教研究不仅要探讨美国本土宗教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境外宗教的美国化,而且要研究美国宗教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海外扩张,从而促进与美国宗教国际化相对应的美国宗教研究的国际化。鉴于美国“宗教出口业”的主要推手是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宗教和宗教组织因此又成为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非传统外交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实践中也已成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因此目前把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从政府和政策层面拓展到对外关系层面,从而扩大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大趋势。

近10多年来该研究领域的另一显而易见的趋势,就是美国外交权力建制内部人士对宗教与美国安全和对外战略研究的关注和介入,有关论著可说是接踵而至,笔者此前对此已有论述。^②如《宗教与安全:国际关系的新关联》^③一书,便认为在宗教与安全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鼓吹结合“道德规则和现实政策”,推进以所谓宗教自由为一项基本内容的反恐战略或“包容的、整体的和先发制人的安全”。该书在首页还引称“把宗教自由问题不仅仅作为人权问题,而且作为安全问题来对待”。《信仰的影响:宗教团体与美国外交政策》^④则是研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议题以及宗教游说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

① 关于美国宗教“出口业”的四要素及其影响的讨论,参见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pp.226—242。

② 参见前引徐以骅:《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24—27页。

③ 见前引 Robert A.Seiple and Dennis R.Hoover, eds., *Religion &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编者赛普尔(Robert A.Seiple)曾任世界宣明会会长及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而胡佛(Dennis R.Hoover)则是赛普尔创办并任总裁的全球接触研究所副总裁以及所属信仰与国际事务中心执行主任,主编该中心期刊《信仰与国际关系评论》(*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④ Ellio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S.Foreign Policy*。编者埃利奥特·艾伯拉姆斯曾任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以及美洲事务三个助理国务卿的职位,2000年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主持该书编辑工作时担任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

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著作；《解救上帝的子民：争取全球人权的非常同盟》^①主要研究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以及宗教游说团体在国会中的作用。《强权和万能之主：关于美国、上帝与世界事务的反思》一书的作者、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及合作者认为宗教无论在一国之内或在国际舞台上均举足轻重，因此呼吁美国外交决策层尤其是民主党人改变对宗教的冷漠和傲慢态度，加大对宗教问题的关注，称今后美国在世界上无论是反恐还是推进民主均要重视宗教的作用。^②前政府官员、美国宗教与外交国际中心的创办人和总裁小道格拉斯·M.约翰斯顿(Douglas M. Johnston, Jr.)的《宗教，恐怖和错误，美国外交政策和属灵介入的挑战》一书延续其早些时候论著的基本观点，即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建制忽视宗教对解决国际冲突问题的贡献，认为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是“被遗失的治国术”，^③把“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界定为“用宗教价值观来弥合敌对双方分歧的外交”，^④并通过实例进一步论证把作为“非理性因素”的宗教整合于建立在“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之上的美国对外关系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法尔(Thomas F. Farr)则强调宗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地缘

① 参见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该书与作者早年著作《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Knoxville, Tennesse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中译本，由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堪称姐妹篇，两者均以美国国会为宗教游说团体的活动舞台；前者专论国内宗教游说，后者则主要分析宗教游说团体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及其立法。

② 参见 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 *The Mighty and Almighty: Reflection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两位作者写道：“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利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参见该书第66页。

③ 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Douglas M. Johnston, Jr., *Religion, Terror and Error,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llenge of Spiritual Engagement*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1), Preface, p.xiv.

政治的重要性,他在2008年3—4月的《外交》上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①在其作为局内人描述美国政府如何推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以及“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运作过程的著作《信仰世界和自由:为何国际宗教自由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他声称21世纪信仰世界的各种宗教思想、运动和社团“对美国海外的基本利益和美国本土的安全具有巨大影响”,^②然而充斥美国外交建制的所谓避教综合征却使其对宗教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并因实际上支持世俗主义政策而与美国自身的“宗教模式”背道而驰。除托马斯·F.法尔的文章外,具有风向标作用的《外交》期刊近年来还刊登了多篇关于宗教与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文章。^③全球接触研究所副总裁丹尼斯·R.胡佛(Dennis R.Hoover)与道格拉斯·M.约翰斯顿还将有关文献结集为《宗教与外交事务:基础读本》一书,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关于宗教与外交事务研究的进展。^④上述著/编者大多具有智库和官方尤其是国务院的背景,这反映了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对宗教问题的看法渐趋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并使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对策性。^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上述学术和对策研究的种种进展,其对美国外交决策层的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美国行政当局的“避教综合征”“启蒙主义偏见”和“宗教赤字”等诸多忽视宗教的现象依然故我,这

① Thomas F. Farr, “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pp.111, 112.

②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8.在该书中托马斯·F.法尔再次表示“跨国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致命威胁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时刻”,可参见该书第35页。

③ 这些文章包括 Walter Russell Mead, “God’s Country?”; Leslie H. Gelb and Justine A. Rosenthal, “The Rise of Ethics in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Scott M. Thomas, “A Globalized God: Religion’s Growing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oreign Affairs* (Nov./Dec.2010).

④ Dennis R. Hoover and Douglass M. Johnston, ed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Essential Readings*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参见徐以骅:《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24—26页;以及本书的相关章节。

还引起上述不少论著的严厉批评,对此本书在一些章节已有论述。涉及宗教问题的智库学者和退休外交官员对美国对外关系中宗教因素的种种关注和强调,在地缘政治考量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外交决策层面显得苍白无力,其影响力还远远不及具有广泛选民基础和庞大组织机构的宗教团体,而宗教团体本身由于种种原因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也颇受牵制,^①因此这些学术和智库精英在宗教问题上对美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在通常的情况下宛如泥牛入海,在实际决策层波澜不惊,其论著和言论的教育和咨询作用也不彰显。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以来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领导人虽常常口不离宗教,言必称上帝,有人甚至称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现代福音主义文化”已是白宫决策的“支配性信条”,^②然而虽然他们有时受宗教信仰的激励和驱动,但他们所推行的主要仍然是基于现实主义而非宗教理念的外交。事实上,忽视宗教、缺乏宗教知识以及不尊重宗教感情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一系列重大外交失误的原因之一。如不少观察者所揭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涉外机构对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所知甚少。在入侵伊拉克前,“在白宫很少有人知道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区别”,而“甚至当伊拉克正爆发一场宗教战争时,美国政府还置宗教于不顾”。^③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化往往对该地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运动和团体有利,这在最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中也得到了印证;为对抗苏联而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之举更是养虎遗患,在某种程度上播下了“9·11事件”的种子。美国也许如其智库人士所言“不是一个宗教威胁”,^④但美国的“宗教出口业”和大张旗鼓的海外传教事业、美国政府对别国宗教状况说三道四,以及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借宗教名义对别国主权

① 参见本书有关章节;另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第529—536页。这些原因包括:美国政教分离的传统、宗教团体内部纷争的传统、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制约等等。

② Jeffrey Hayne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he U.S., India and Ira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p.150.

③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p.118.

④ Jack Mil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36.

和内部事务的侵犯和干涉,即本书所称的美国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种种做法,确实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感到是某种“宗教威胁”。概而言之,美国的宗教复兴尤其是福音派的“宗教觉醒”难以改变本国外事机构尤其是国务院的世俗主义文化,托马斯·F.法尔甚至愤愤然地把美国国务院描述成“美国最昭然若揭的世俗机构之一”。^①

美国政府对国际宗教问题的懵懂和误判,在中国问题上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本书的最后两章和其他有关章节对此已有较充分的叙述。笔者曾指出,宗教是“中美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和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个领域”。^②而造成目前中美非正常宗教关系的一个主因,在于美国政府及有关组织和个人基本无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宗教自由和人权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其官方和半官方的所谓宗教自由报告严重滞后,大失水准,完全不能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从积极方面来看,宗教作为中美关系最具地方性、民间性和基础性的因素之一,其对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潜能和必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拓宽中美双方在宗教信仰领域的民意沟通的渠道,实现中美宗教关系的正常化,对构建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出版本书的说明。

本书共分9章,分别对2004年以来美国宗教发展以及包括各次大选和中期选举在内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跟踪研究,并对近十年来宗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了对策性分析。本书的各章大部分曾在国内专业期刊上发表,部分还发表于英、法文期刊。此次出版除个别订正外保持文章原貌,以反映笔者不同时期对美国宗教尤其对宗教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

^①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ix.

^② 徐以骅:《重视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代序)》,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第七辑),第3页。

在2004年出版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中,笔者把国际上美国史学研究“主要能胜任,间或有创见”的目标,移植来作为我们美国宗教研究的评价标准,并指出研究美国海外传教尤其是对华传教运动的历史是我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可以有较大作为的领域。这一评判标准目前无需作太大调整,但随着美国宗教的全球化发展,该领域便为国际学者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等,均已成为中国学者可以有较大贡献的议题,更不用说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对策性研究。推进国内美国宗教研究以及宗教与中美关系的学术和对策研究是本研究的宗旨,尽管本研究与上述评判标准尚有不小的距离。

本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05FCZD0015)的最终成果。自立项以来,本研究团队完成了不少中期成果,其中包括2012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第七辑),以及2013年出版的《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八辑)。除上述研究项目外,本研究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06JJDGJW001)、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建设”,以及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部分资助。在此笔者对上述项目和单位的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笔者能力有限,研究议题又颇为庞大,故错误疏漏之处肯定不少,祈望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2013年8月于上海西郊